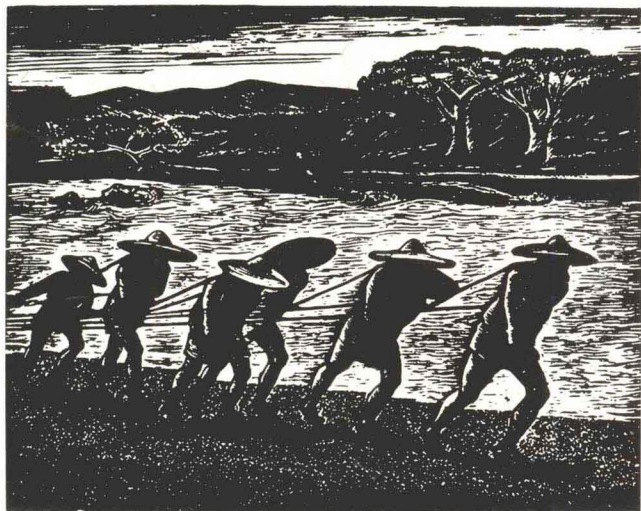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李云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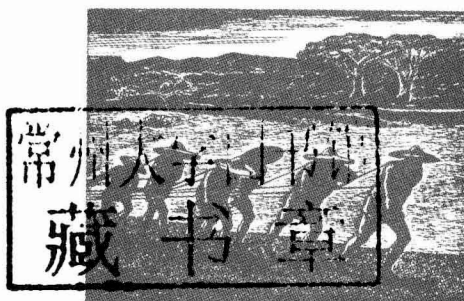
重申“新文学” 的理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云雷 著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 李云雷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2593-6

I. ①重…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5190 号

书 名: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著作责任者: 李云雷 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593-6/I·26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30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首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杨庆祥、霍俊明、梁鸿、李云雷、张莉、周立民、房伟等7位优秀青年评论家成为首批客座研究员。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批7位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7位青年批评家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这套“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

是为序。

吴义勤

2012年金秋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5

问题与方法

我们为何而读书？ 2

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

——“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 14

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2011年长篇小说综述 26

新世纪“底层文学”论纲 38

“打工文学”的问题与前景 57

“内心的疼痛”如何表达？

——读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 62

都市文学的五副“面孔” 66

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

——关于“都市文学”的发言 77

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 81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 90

新的体验，新的美学

——评“70 VS 80后” 97

理论内外

-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108
- “文学”与我们的生命体验 111
- 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 116
- 批评是一种创造 120
- 如何重建批评的公信力? 123
- 韩少功的“突围” 129
- 我们为何怀念路遥? 137
- “怎么说呢”
——王祥夫小说集《愤怒的苹果》序 139
- 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
——读陈应松近作三篇 145
- 我们能否理解“故乡”?
——读梁鸿的《梁庄》 154

细 读

- 历史的碎片与“地方志”小说
——读铁凝的《笨花》 166
- 1980年代的梦幻与爱情
——读于晓丹的《一九八〇的情人》 170
- 隐秘的疼痛及其诗意表达
——读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 175
- 记忆的诗学及其穿透世界的力量
——读付秀莹的《旧院》 179
- 一篇小说的三种读法
——读迟子建的《起舞》 185
- 小说的“核”与层次感
——读林那北的《今天有鱼》 188

一个女人的“史诗”

——读孙慧芬的《秉德女人》 191

尴尬，如何成为现代寓言

——读顾前的《平安夜》 196

孤独的世代及其奇诡的想象

——读笛安的《宇宙》 200

从“烈火青春”走向开阔的世界

——读刘丽朵的小说 204

两个藏族人的英雄史诗

——读达真的《命定》 209

小批评

谁能认定“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由马悦然高度评价曹乃谦说起 214

《兄弟》为什么这么差？ 219

拿什么炮轰文学界？

——略谈《如焉 @sars.com》 222

比艾滋病更可怕的……

——谈《丁庄梦》 227

《风雅颂》读后，或一种批判 231

从《不食》谈鲁敏近期的创作倾向 234

艺术如何切入现实与内心？

——读胡性能的《下野石手记》 236

谁是“你们”，谁是“我们”？

——读姚鄂梅的《你们》 239

颠覆“白毛女”？

——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242

乔叶的“化学反应” 246

王蒙的“编织术” 248

三十年后读《伤痕》	250
重读《哥德巴赫猜想》	254

域外一瞥

“托尔斯泰在我们心中”	260
成为卡夫卡，是不幸的	262
黑塞，或童年的回忆	264
日本的“《蟹工船》现象”及其启示	266
我们能否理解卡扎菲？ ——读《卡扎菲小说选》	275
从排斥到认同 ——二十年来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接受史”	287
《赵南栋》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298
告别的艰难与缱绻 ——读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304

附 录

从“纯文学”到“底层文学” ——李云雷访谈录一	308
为什么一条路越走越远？ ——李云雷访谈录二	320

后 记	331
-----	-----

问题与方法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

——《我们为何而读书？》

我们为何而读书？

—

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

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想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

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000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骄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三十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二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为人看不起，因为是农民的女儿，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父母与乡村，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或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会议论纷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平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19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

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由于我们将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外国又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捷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

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轻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与关于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底层文学”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底层”与“文学”的一个交集。

三

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精英垄断”。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垄断，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利益，而且试图将他们的“垄断”永久持续下去，这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如今，不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中产阶级与“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在分化与瓦解。最近出版的《蚁族》一书，描述了“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底层”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社会从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表现。如果底层青年被堵死了一切出路，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至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对“个人奋斗”、“竞争”、“成功”的神化，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想，在他们的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精英”阶层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不断强化他们这一想象。但在现实中，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大多数